

# 巴中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 (2024 年度)

|           |                  |
|-----------|------------------|
| 项 目 类 别   | 自筹课题             |
| 立 项 编 号   | BZ24ZC034        |
| 学 科 分 类   | 党史党建             |
| 课 题 名 称   | 川陕苏区核心区域农业生产发展研究 |
| 项 目 负 责 人 | 唐华林              |
| 项 目 参 与 人 | 喻泽生 苏杭           |
| 负责人所在单位   | 中共巴中市巴州区委党校      |
| 联 系 电 话   | 0827-5799230     |

巴中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制



# 川陕苏区核心区域农业生产发展研究

农业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国作为农业大国，自古以来便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战略转移到川陕边，与当地中共党组织、地方武装以及人民群众相结合，创建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川陕苏区在两年多的革命斗争中，以农业建设为首要任务，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有力的支援了革命，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 一、红军入川前川陕边农业发展概况

川陕边区地形复杂、地貌独特、地势险要，拥有天然的资源优势。但由于这里长期受军阀、官僚、地主、土匪的剥削压榨，农业生产方式单一，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百姓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 （一）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概况

1.幅员辽阔。川陕边地区主要指大巴山和米仓山之间的四川东北部和陕西南部的广大地区，巍峨雄壮的大巴山和米仓山山脉由东至西横卧在川陕交界处，主峰海拔2300米至2500米，这里崇山峻岭，层峦叠嶂，沟壑纵横，地势险要，为历代兵家必争的“秦川锁钥”。川陕边区纵横宽广、幅员辽阔，川陕革命根据地极盛时期疆域东起城口、万源边境，南迄营山、渠县，西至嘉陵江东岸，北抵陕南宁强、镇巴，“包括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万源、平昌、宣汉、达县、开江、渠县、大竹、苍溪、阆中、

南部、仪陇、蓬安、营山、旺苍、广元、昭化、剑阁、城口、开江、梁平 23 县和陕南的宁强、西乡、镇巴 3 县，”总面积达到 4.2 万平方公里。

2.气候差异大。首尾相连的大巴山和米仓山，将川陕这块土地一分为二，以两山为界，北为关中平原，南为巴蜀大地，高大的山脉抵挡了北方冬季寒流的侵袭，川东北形成亚热带季风气候。这里地势较为平缓，多为丘陵到低山地区，平均海拔 300 米到 1000 米不等，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最冷月气候平均保持在 0℃ 以上，夏季三伏天气温可达 35℃-39℃，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气候条件，适宜农作物生长。而川北地区山体高大，森林密布，同时受山体垂直海拔高度影响，气候差异较大，夏季炎热，冬季寒冷，山顶冰雪半年不化，又常经历风、虫、水、旱、冻等自然灾害，农作物所需光照不足，生长较为缓慢，农作条件差。

3.物产丰富。川陕边优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丰富的物产。粮食作物有水稻、小麦、玉米、薯类、豆类等；经济作物有油菜籽、烟叶、芝麻、棉花、茶叶、黑木耳、银耳、药材等；矿产资源有铁、煤、铜、硫、锡等。此外，大巴山北有汉水，南有嘉陵江及渠江水系的南江、巴河、通河、渠江、州河等，分别经汉江和嘉陵江注入长江，常年可通舟楫，鱼类也相当丰富。但是，由于长期在封建势力的统治和压迫下，川陕边区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未得到根本性开发与利用，生产力十分低下。再加上崎岖陡峭的地势和落后的经济条件使得交通不便，百姓所需物资难以

进行交易和买卖，这极大程度上制约了农业发展，当地农业经济十分落后，仍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

## （二）社会概况

1.军阀割据混战。红军入川前，川陕边区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19**年，四川开始实行“防区制”，各路军阀驻防情况：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占据重庆、川东；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占据成都一部和川中、川南和西康省东部；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占据成都一部和川西北；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占据成都一部和通南巴等川北大部；二十军军长杨森占据广安、营山、岳池、渠县；川陕边防军督办刘存厚占据达县、宣汉、万源、城口。各派军阀拥兵自重，称霸一方，到**1932**年底，“刘湘**211500**人、刘文辉**165000**人、邓锡侯**88000**人、田颂尧**59000**人、杨森**45000**人”。为了扩大自己防区，军阀之间长期混战，据不完全统计，“**1912**年到**1934**年间，四川军阀大小混战**470**余次，平均每月两次。”无休止的军阀混战，耗费了大量的资金，为了维持军费开支，各派军阀将魔爪伸向了穷苦百姓。他们大肆征收苛捐杂税，强夺人力财力，当时，各种名目的捐税多达**70**多种，居全国之首。

2.地主盘剥压榨。在军阀疯狂掠夺、压榨的同时，封建地主凭借着土地所有权，以地租的形式残酷剥削农民。“**1922**年，四川省农民人均土地一亩零四厘，陕西省农民人平三亩八分。占总人口**85%**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却只占有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几，而占人口**9%~12%**的地主、富农却占有**74%~80%**

的土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农民向地主租种土地，需要上交半数以上的收成作为地租。若遇严重灾荒之年，粮食颗粒无收，佃户也得用家中物什作为抵押物。农民除受地租剥削外，还受到高利贷剥削。当农民无力缴纳繁重的捐税，或遇自然灾害，只得向地主借高利贷。高利贷分两种：一是“借粮”，二是“借钱”。“借粮”利率一般是三成至五成，春夏借秋收时还。“借钱”分为三种，分别是：场息、月息、年息，利率一般是一成至五成。高利贷中最高的一种是又名“解斗利”的场息，以一场（三天）为界限，借十元，一场后翻一番。农民一旦陷入高利贷的火坑，往往倾家荡产。地主剥削阶级加在农民头上的地租、高利贷，军阀官更加在农民头上的繁重捐税，再加上土匪猖獗，贫苦农民往往被逼得走投无路，生活困难，地区经济社会被搞得支离破碎、民不聊生。“三月杂粮三月荒，三月野菜三月糠，年年没有过年米，大人娃儿泪汪汪”就是当时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 （三）农业发展概况

1.土地滥用。为了填补因混战造成的军资短缺，军阀官僚们抢尽占尽良田好土，强迫农民大量种植鸦片。正所谓“带兵两三年，世代不种田”，全国种植鸦片的热潮以四川最盛，四川又以川东北最为突出。1932年，四川省鸦片产量超过4万两以上，“以每亩产烟五十两计，则川省田亩约为八百万亩。”巴中鸦片种植面积约占总耕地面积的30%-40%，宣汉县南坝区年产鸦片7万担。此外，普通百姓不分贫富，每户还需交鸦片烟税“十元

半”，名为“特别捐”。当时巴中每年都要缴纳一百万两的特别捐，其中通江缴纳七十万两，南江缴纳三十万两。军阀表面上设立“禁烟”局，实则将收来的鸦片以高价售给烟商，从中牟取暴利。于是，烟田不断增多，粮田相应减少。通南巴的农村变成了一片“纵目田畴，已成黑化”的惨象。

2.劳动力流失。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沉重不堪的高利贷，猖獗横行的土匪强盗，难以预料的天灾人祸使得无数贫苦百姓饥寒交迫，甚至饿殍满地。他们为了生计，有的被迫租种土地，有的被迫向放贷者告贷，然而无止境的压榨和勒索，穷苦百姓们即使时时刻刻“面朝黄土背朝天”也改变不了缺衣少食的境况，被饿死、冻死、病死、打死的农民不计其数。渠县从**1911**年到**1932**年的**22**年间，人口减少了**111050**人。除此之外，军阀们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经常强迫贫苦农民入伍补充兵源。按照当时的规定，百姓不分贫富，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抽。但实际上富豪家庭的壮年男子不当兵，贫苦百姓即使独生子也被强征。为了逃避被抓壮丁和忍受不了军阀、官僚、地主、土匪的敲诈勒索，不少人背井离乡，远逃他方，以致到处都是“房屋无人住，田地无人耕”的凄凉破败景象。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而留下来的农民也大都对生活丧失了信心，他们被困于压榨的牢笼中，也困在了自己不愿和不能扩大生产的桎梏中，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力量日渐薄弱，农业生产也逐渐落后。

3.生产资料匮乏。一方面，受地势影响，川陕边部分地区处于山地，土地贫瘠，坡陡土薄，气候寒冷，难以种出高产量农作

物。另一方面，境内山地崎岖，通行受限，常说的“要想富，先修路”也由于经济落后成为幻影，运输全靠人力肩扛和牲畜驼载，交通梗阻直接导致难以购入农业生产所需物资和引进先进技术。再者，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农民受到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剥削压迫，维持基本的生计已成问题，更没有闲钱去购买农具、种子、耕牛、肥料等生产资料，以及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缺乏技术人员的指导，耕作方法显得原始又简单，农民耕种土地，一般只耕种一遍就种上种子，也不施肥、不除草，农作物后期生长环境恶劣，营养跟不上，导致产量低、周期长。川陕边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物产资源，给当地带来了农业生产潜力，但在军阀官僚、豪绅地主、土匪强盗的剥削下，备受打压的农民丧失了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受限，亟需革命来改变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

## **二、川陕苏区农业建设发展措施**

“农业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创造历史的首要条件。”当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来到川陕边这块土地，要想立足扎根，巩固发展根据地，就必须解决苏区人民群众和红军官兵的军需民用问题。农业生产作为经济建设的第一位，亟待改变生产关系，发展农业生产。

### **（一）开展土地革命**

毛泽东曾强调，“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1933年2月7日，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委员会，大会决定，广泛深入地开展分配土地的



斗争，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打垮封建统治势力。**17**日，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即省工农民主政府，大会讨论布置了关于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和建立地方武装的问题。大会指出，为了发动工农劳苦群众参加革命斗争，消灭封建制度和彻底改善农民生活，应迅速地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为了巩固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一开始就把土地革命的旗帜树立了起来。**2**月发布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改革的布告》指出，“无条件的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田坝子、山林、房屋等。雇工、贫农、兵士、失业而愿意亲身去做庄稼的穷人，都应分得土地。”中农的土地不没收，仍由自己耕种，所有收成由自己所有；将请人耕种土地、放高利贷的富农划为剥削分子，并没收其土地，但自己耕种的富农可以分一些较差的土地；地主豪绅家的土地、耕牛、农具全部没收。没收后的土地以产量为标准，按人口平均分配给穷人，所有收获均归耕种者所有。另外，凡是参加红军和游击队的雇工、贫农、中农都应分给最好的田地，还由苏维埃政府对没有耕种能力的人组织代耕，白区工农和白色官兵参加红军的同样分给土地，白区医师、技术人才、专家、教员等来苏区工作的人员只要遵守苏维埃政府法律，同样分给土地。此外，重新修改发行的小册子《怎样分配土地》，将为什么要分配土地，怎样分配土地，农村阶级成分划分等都作了明确规定。**1934**年秋，编印《平分土地须知》《农村阶级划分（五言歌）》等一系列法令、政策文件，确保了土地革命深入进行。

红军解放巴中后，从红十二师和十一师中选派出了大批红军战士协助地方苏维埃政府进行土地分配工作。这一时期，为了培训乡村工作骨干，巴中县委在开办的培训班中专门开设了土地革命的专题培训，为顺利开展土地革命培养人才。各级苏维埃政府大力宣传土地法令，并把打土豪分田地作为震慑剥削阶级、动员穷人投入土地革命的重要手段，各乡、村迅速掀起了分田高潮。首先，建立层层主管土地分配的组织机构，乡设“土地委员会”，成员包括乡苏主席、土地委员以及雇工会、贫农团、妇女会、少先队、共青团等组织代表，村设“分田小组”，具体负责土地分配工作。其次，划分阶级成分，分清敌我，确定打击对象。然后，对各村土地面积进行清理、分配，除预留的红军公田外，其余按全村人口平均分配，富农一律调成坏田坏地。最后，以村为单位，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征求意见后，在田地边界插上竹签，标明田地主人姓名、田名和面积，并登记造册。

在土地分配的过程中，由于对普通群众宣传教育不彻底，个别地方个别群众对革命形势认识不清，部分群众不敢公开反抗地主，甚至暗中交租；由于干部管理不到位，有的区乡干部包庇地主，暗藏土地不分，甚至优亲厚友。因此，这一阶段的土地革命并不彻底。三次进攻战役胜利后，川陕省相继召开了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和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强调：“赶快组织查田运动，地主隐藏的土地要一律查出来分配给贫、雇农，中农土地不动。”这一时期，各县苏维埃政府按照省苏维埃政府要求，由县上派出工作人员，和区、乡、村土地委员一道对土地开展了复

查，即查田运动。查田中打击和没收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富农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土地复查由“查田队”组织实施，负责调查，一查地主田地是否完全被没收；二查富农是否仅仅留下坏田；三查贫农、雇农、红军家属是否分得好田；四查红军公田耕种情况；五查下级苏维埃委员的成分和工作情绪，配合“改造苏维埃”工作。在查田运动中，各级苏维埃政府执行平均分配土地政策，对包庇地主、富农的干部进行了清理，对一些不与红军为敌、未逃跑或虽逃跑但家中还留有人的地主、富农家庭也分给了少量土地。查田后，发放红军统一印制的《土地使用证》以做凭证。在查田运动中，苏维埃基层组织从实际出发，坚持灵活性和原则性相结合，严厉镇压了反革命，促进了苏区生产发展。

土地革命解决了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又是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基础。通过开展土地革命，不仅废除了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还让广大农民真正掌握了土地这一重要的生产资料。农民利用分得的土地、农具、耕牛、种子积极生产，大力提高了粮食产量，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战争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 （二）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措施

红军解放巴中后，田颂尧等军阀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政策，下令“凡有擅将粮食、食盐、制造可供军火之材料、汽油、煤油、电料、卫生药品物资输入苏区者，一律处以死刑”“加紧封锁，断绝接济，尤治‘匪’有效办法”，给苏区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大困难。红军在川北要想巩固和发展革命，就必须制定相应政

策，实施相应措施，努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

**1.强化党和政府领导。**川陕苏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苏区党和政府思深益远，统筹谋划，设置专门组织机构和制定相关方针政策，加强宣传动员，调动生产积极性，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一是设立组织机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设立了经济委员会建设局专门负责组织领导开垦荒地、改造农业、培养森林、豢养牲畜、经营耳山、奖励生产等工作；省土地委员会水利局专门负责组织领导修筑塘堰、开沟开河、修渠灌溉；省土地委员会土地培养局专门研究土壤种籽、种植作物、农具肥料。巴中各县苏维埃政府设经济委员会和土地委员会，区、乡苏维埃政府设土地委员会，村设土地委员，负责巴中各县农业生产的组织领导。**二是制定方针政策。**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发展，苏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春耕运动宣传要点》指出，“加紧春耕，充实赤区粮食；加紧春耕，农民穿吃不愁；加紧春耕，快快消灭刘湘。”**1933年6月**，中共川陕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指出，“迅速分配土地，扩大耕种，赤区一寸土地也不要荒废。”**1933年8月**，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定了《公粮条例》，规定农民在吃饱吃够，且留够余粮的前提下才交纳公粮。**1933年**，川陕省发出布告，“赤区奖励种有益身体的谷类，一律禁止种鸦片烟。”**1934年4月底**，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又发出了《加紧春耕戒烟运动》。除大抓粮食生产外，苏区还注意发展白耳、茶叶、棉花、白腊、药材等经济作物和耕牛、骡马、生猪等养殖业。**1934年5月**，川陕省委更是提出“每

户喂 4 头猪、4 只鸡，每个人点 5 窝至 20 窝包谷，以多种小菜、多喂牲畜来增加农民收入”的生产号召。**三是组织宣传动员。**劳动力作为农业生产的核心要素之一，要实现苏区农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从数量和质量上得到双重保障。苏区政府积极作为，组织广大群众和干部参加生产运动，除了调动壮年劳动力在生产中的主心骨力量，也充分发挥妇女、青少年和儿童在生产中的作用。当时，由于武装斗争激烈，许多青壮年男子参军抗敌，妇女就成为了农业生产主力军。《春耕运动宣传要点》动员妇女，“男人参加红军运输队，在家的妇女姊妹，赶快挖地点粮食，下一季不愁吃穿。”这既是解放妇女的需要，也是利用了妇女的独特价值助力农业生产。此外，还积极动员红军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红军一面执行战斗任务，一面从部队中抽出数名干部和战士，组成工作队参与农业生产。

**2.改良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要想得到本质上改变和提升，在保障足够劳动力的前提下，还需要充分发挥土地、农业生产技术两大核心要素的作用。**一是开垦荒地，禁种鸦片。**苏区幅员辽阔，土地宽广，要提高粮食收成率，就必须对过去闲置荒废和集中种植鸦片的土地进行开垦利用。一方面，苏区政府号召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组建“开荒队”，动员百姓将根据地内荒废的土地开辟出来，扩大耕地面积，加紧春耕、秋耕运动，种菜种粮，保障军民基本生活；另一方面，提出禁种鸦片，多种粮食的口号，并颁发《戒烟条例》等法令，严厉打击种植鸦片行为，以此解放田地和劳动力，扩大粮食生产。**二是积肥造料，改良土**

壤。粮食生产仅靠土地难以支撑，更需要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养料来提升农产品的生产量。“1934年2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号召各级经委会要‘宣传群众多养牛（特别是母牛）、猪、羊、鸡、鸭充实他们自己的经济来源’，并要‘多多准备人粪、畜粪和堆肥，培灌夏苗’。”各级党政（机关、部门）通过建立养殖场、畜牧场，发展牲畜合作社等方式，开辟肥源，积肥造料，为粮食作物生长提供足够的肥料，改良农田土壤结构，增加粮食产量。

**三是兴修水利，发展灌溉。**农业发展离不开水利建设，要发展农业就必须改善年久失修的水利条件。各地苏维埃政府组织广大农民疏通河道，开挖运河，因地制宜修塘筑堰、疏通渠道和筑堤筑坝，不仅畅通了船运，也减少了下游水患，方便沿河两岸农田灌溉。

**3.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为变革生产关系，提高劳动生产力，苏区政府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合理有效地整合调剂人力、种子、耕牛、农具等各种资源，以集体劳动代替个体劳动，提高农业生产运作效率，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一是实行劳力换工。**为了改变粮食收获时间集中和农业生产方式落后所带来的人力物力不足的问题，苏区农民自发形成了农忙时节互助换活的习俗。根据这一习俗，苏区政府积极动员和组织群众，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实行劳力换工。“当时的乡村苏维埃政府根据群众生产习惯的要求，将劳力编成组，按十几户人编为一组，由村代表负责领导，集体出工生产，调配劳力，先做公田，后做私田，实行劳动互助，做完一家又做另一家。”

**二是开办耕牛、农**

具、种子合作社。《平分土地须知》中指出，“开办农具、种子、耕牛合作社，以解决所有农业耕种上的难题。”土地革命中，将豪绅地主的耕牛、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分发给农民，但依旧存在着各类资源匹配不合理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政府的积极号召组织下，各地先后建立了耕畜、农具经营处，将各类资源有效分配，解决了农民生产资料不足的问题。巴中奇章乡苏积极组织乡村干部参加生产，并把从地主豪绅手中没收的农具、耕牛分给农民，将富余的耕牛农具收归乡苏，调剂分配到其他乡使用。三是组织代耕队。“川陕苏区党、政领导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不让任何一寸土地荒芜，解决劳动力不足的红军家属及劳动力短缺的农户的生产困难，提出要‘彻底实行代耕制’。”代耕队由贫雇农、党团员组成，零报酬的替红军家属、无劳动能力的人耕种收成。1933年，巴中县军区指挥部指挥长刘大海见当地缺乏劳动力，水稻成熟无人收割，亲自率领少先队、赤卫队帮助农民收割水稻。

4. 给予财政金融支持。农业作为第一生产力，也是支撑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基础产业。苏区政府十分重视农业发展，始终将农业放在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通过投入财政资金来支援农业生产。一是投入财政资金。苏维埃政府把没收得来的土地、农具、种子、耕牛等生产资料分配给农民使用，“并支付了创办水利，开办农具、种籽、耕牛合作社的费用，以及为增加生产力而开展的戒烟运动的费用”。对缺乏种子的农民，政府免费发放种子供其种植，避免贻误农时；对堵塞不通的河道，政府出钱统一

规划，进行水利修缮、河道疏浚，便利农田灌溉；对缺乏耕具、人力的家庭，政府出资建设合作社，统一调拨耕牛、农具，统一组织代耕。**二是提供农业贷款。**1933年，川陕省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以下设立工农银行、工农税务局。当时受战争影响，政府财政紧张，以实物放贷为主，即将没收而来的耕牛、农具、种子分配给穷人。根据地巩固之后，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银行则积极开展储蓄业务，动员群众将闲置资金投放进银行，支援农业发展。“银行一方面吸收农民群众的零碎资金，另一方面向穷人作无息或者低息的贷款。”**三是开展对外贸易。**《财政经济问题决议草案》指出，“收集黑白木耳、桐油、白蜡、木材、猪毛、羊皮等赤区多余或不需要的东西输出白区；由白区大批收购棉花、布匹、西药、食盐等赤区急需的东西。各边区立刻建立对外贸易的机关，奖励苏区农民，发展对外贸易。”苏区政府抓紧对外贸易工作，既引进了赤区百姓所需物资，又将富余物资输出，扩大了经济来源。

通过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苏区的农民不仅在政治上得到了解放，经济上也得到了发展。正如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写道：“川陕苏区的农业收成良好，增强了苏区的经济实力，保证了红军的供给，支援了革命战争，解决了农民吃饭穿衣的大问题，使根据地赖以生存和巩固发展，推动了工业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 **三、川陕苏区农业生产发展的影响**

由于川陕苏区这一系列关于农业生产政策和措施的实施，农



民劳动情绪高涨，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农业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不仅保障了红军战斗过程中所需的粮食供给，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农业的发展直接或间接的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苏区建设更加稳固。

### （一）保障了红军的粮食供给

1933年11月4日，苏维埃主席会议决议指出：“目前集中粮食是主要的工作，各级苏维埃要加紧做。完成集中50万石粮食，消灭刘湘。”由于战事吃紧，加之敌人经济封锁和边区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吃饭问题是摆在红军面前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红军入川前，边区的土地被各方势力控制占有，农业生产极度落后，贫农粮食储备几乎为零。因此，川陕苏区建立之初，红军主要靠打击豪绅地主，没收他们的粮食来解决军用问题。后期，地主富农存储的粮食难以继续支撑逐渐庞大的红军队伍，且敌人步步紧逼，战况激烈，红军粮草必须得到补给。于是红军改变思路，立即发动农民群众，积极生产，从根源上解决粮食问题。在军民齐心、措施得当的努力下，川陕苏区农业发展迅速，粮食获得了大丰收，红军军粮得到有效保障。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川陕苏区17个县粮食局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共筹集稻谷、大米、玉米、豆类、薯类等各种粮食达3.3亿多斤。基本解决了红军的吃饭问题，为革命战斗提供了足够的粮食保障。

### （二）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川陕苏区建立之后，政府带领群众集中力量发展农业生产。

通过土地改革运动，打土豪、分浮财，查田查阶级，土地不再成为封建地主、富农、军阀的专属，农民也不再成为他们的“奴隶”。生产资料由少数地主阶级占有而变为大多数贫农占有，封建土地所有制被摧毁，建立起了新的生产关系，边区原先单一的、落后的农业生产模式得到改变。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一改往日的怨声载道、唉声叹气，满怀激情与信心地投入到了土地耕作中去。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粮食大丰收，农业大增产，农民解决了基本的吃饭问题。**1933**年至**1934**年，巴中各县农业得到空前恢复和发展，无论粮食，或是棉花、甘蔗、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都获得了较好的收成。各地平均每亩土地能收获粮食**300**斤以上，较以前增长两倍多，有些乡村的亩产甚至达**500**斤左右；棉花亩产皮棉达**60**斤以上，增长了**3**至**4**倍。化成、清江、中兴一带的农民普遍反映：“**1933**年至**1934**年期间，农村家家户户都喂了**2**至**3**头肥猪，吃肉不成问题。”可见百姓的吃饭已经不成问题。间接结果就是农业带动了工业、教育、卫生等其他事业的发展，工业事业发展使得百姓有了更多的赚钱机会，收入得到大幅度增长；教育事业发展使得百姓受到了知识洗礼，精神得到极大解放；卫生事业发展使得百姓摆脱了疾病困境，健康得到重大保障。通过发展农业经济而带动的这一系列生活状况的改变，说明了苏区群众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地提高。

### （三）促进了川陕苏区经济的发展

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川陕苏区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粮食富足，农民便有更多的金钱、时间与能力去推动其他

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

在川陕省委、省苏的领导下，川陕苏区的工业、对外贸易、水利交通等各项事业均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除了逐步建立的小兵工厂、钢铁厂等军用工业，根据地还建设了糖坊、被服厂、斗笠厂、造纸厂、农具厂等民用工业，供应补充军队所需之外，还供应民需，生产民众日常生活用品。至**1935**年初，川陕苏区的公营工厂已经有**10**多个。与此同时，政府还十分注重发展对外贸易。**1933**年**11**月，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上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广大群众“发展合作社或经济公社的组织，奖励群众从白区运布匹棉花盐铁等到苏区来卖，苏区群众运白耳鸦片烟等卖至白区”，保证从白区购买根据地所需用的粮食、盐巴、布匹等物质，供应苏区工农兵群众的生活需用。通过商品交换，有效促进商业流通，实现经济增收。另外，发展水利交通也是苏维埃政府的一大重要措施。为适应革命战争需要，便利群众，政府一方面修筑干道，发展陆路交通；一方面修桥疏河，兴建水上交通；再一方面修船造船，增加交通工具。**1933**年初，苏维埃政府动员木工、石工等民工修建巴河大桥；发动群众疏通巴中到江口、江口至通江苦草坝的水上航道，清理了恩阳至后坝、三江**60**多公里的河床。川陕苏区经济发展迎来了新阶段。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先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方位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

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川陕苏区时期如此，如今亦如此。要维稳时局，实现现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始终把农业生产摆在重要位置，紧握国家粮食供给主动权，增强农业科技创新驱动力，为新时代牢牢端稳“中国饭碗”。